



摘要：新中国建立的出版体制，实行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这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在旧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这是时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力主推动的为纠正旧中国出版业混乱无序的状态而创立的新体制。

关键词：胡愈之；新中国出版体制；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体制在1949至1956年间逐步建立。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出版体制基本上与前苏联相同，甚至可以被称为“苏联模式”。但相比于前苏联，中国出版体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编、印、发三家分立，即出版社只管编辑和出版，印刷厂负责图书的印刷和装订，书店担任发行和销售。有学者将这个制度创新归因于首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以胡愈之为署长的出版总署，是怎样贯彻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是怎样学习苏联模式，又是怎样根据国情走上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之路的呢？

一、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历程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版总署成立，胡愈之任署长。出版管理机关即出版总署的设立

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结果，胡愈之曾表示：“苏联的出版事业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苏联出版事业走在我们前边，它有三十年的历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①1949年2月，前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立出版总署，统一领导前苏联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中国出版总署的设立，只比前苏联晚8个月。参考苏联模式，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出版业由分散经营走向集中统一。

（2）1950年10月至1952年12月，实行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3）1952至1956年5月，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5月，新中国的出版体制总体建立，前苏联用了20年时间（1919~1939）建立社会主义出版体制，中国只用了6年。

具体来说，新中国出版体制建立的第一步，是走集中统一的路子。虽然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样的企业做基础，但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的做法。1919年苏俄把众多的国有出版社合并为国家出版社，既负责出版图书，又负责对全国出版企业进行调整和监督。前苏联是以出版社为中心迈出第一步，而中国是以新华书店等发行部门为中心迈出第一步。1949年10月3至19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胡愈之做了《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1950年4月1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1951年元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五家单位组成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为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单位，直到1954年元旦并入新华书店。在集中统一的过程中，公私出版事业都统一到国家领导之下，这也符合《共同纲领》“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规定。胡愈之领导的出版总署的工作方针，就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共同纲领》来办事。

新中国出版体制建立的第二步，是实行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1950年4月，胡愈之提前半年透露出这一决策：“出版总署打算在今秋召开一次全国出版会议，来解决这统一与分工的问题，以后将由分工而走向专业化。”“在统一中求分工，从分工中得到专业化。”^②1950年9月15至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

议在京召开,胡愈之做了《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会议主要通过了三项决议:(1)国营新华书店成为专营发行的机构;(2)出版与发行分工,印刷与出版分工;(3)出版专业化。^③1950年10月28日,根据政务院指示,出版总署做出决定“出版企业、印刷企业和发行企业三家独立”。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一分为三:以出版国家政治书籍为专业的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新华书店总店。出版总署决定在1951年元旦前完成三家分立,地方人民出版社、地方印刷厂直属地方出版行政机关,比照新华书店总店的方式完成分立。1952年4月,出版总署相应设立一厅(办公厅)三局(出版管理局、印刷管理局、发行管理局)。至此,中国在进行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就已经实现了编辑、印刷和发行的三家分立。

第三步就是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私营出版业属于私营工商业范畴,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9月25日,出版总署提出五年计划:平均每年整顿和取缔20%的私营出版社,争取到1957年全国出版业基本上由国家掌握。^④1954年8月14至15日,中宣部批转出版总署《关于改造私营图书发行业的报告》和《关于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业的报告》,决定对私营图书出版和发行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将一部分私营出版社改组为公私合营出版社。改造后,私营出版社的数量逐步减少,到1956年初,中国已没有私营报纸和期刊。到1956年6月,对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比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提前了半年。

1954年11月30日出版总署改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胡愈之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在担任出版总署署长的五年里,经历了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过程。出版业是私营工商业中最早完成改造的行业,这与胡愈之领导的出版总署积极贯彻总路线密不可分。

二、编印发分立制度与苏联模式显著不同

实行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是新中国出版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出版业进行分工,是希望通过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1949年10月,胡愈之在新华书店

出版工作会议报告里说:“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内,出版和发行都是分开的。”^⑤第二年他又说:“讲分工,首先应当使出版和发行分工。出版和发行,搞成一篮子,这是中国出版事业不发展的一个原因。……书刊的出版和发行,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业务,应当分工。出版和发行分工以后,出版部门可再分工,例如有的出文艺书,有的出理工书,有的出学校教科书,诸如此类,各有专业。”^⑥中国出版体制编印发分立的特点与苏联模式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

前苏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1~1925),开始成立各种专业出版社。专业分工大体分为三大类别:一是依托国家有关部门而设立的出版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营出版社基本按照这个思路来建立。二是党的出版机构。党的出版社在前苏联时期尤其占有重要地位,1990年,前苏联有260多家出版社,其中党的机关系统中有114家,几乎占到一半。^⑦三是根据生产特点成立一些专业出版社。另一方面前苏联的出版、印刷与发行基本是一体化的。1919年,前苏联把众多的国有出版社合并为国家出版社,国家出版社不但是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印刷机构。1922年,国家出版社还成为书籍发行方面的主要机构。前苏联的出版机构也可以自办发行业务。总的说来,前苏联的分工方式是建立专业化出版社,每一个出版社只出版、印刷及发行某一大类的书籍,是一种横向的分工;而新中国的分工是把图书的生产流程分为编辑、印刷、发行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由不同的部门组织负责,是一种纵向的分工。前苏联始终都未实行严格的三家分立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则雷厉风行贯彻执行,编辑、印刷、发行各自为政、彼此分离。

胡愈之认为,专业化出版社的建立,是在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的。“出版与发行工作分工以后,出版工作也要分工。……最好的办法就是出版专业化,比如出版教科书的专门出版教科书,出版文艺书的专门出版文艺书,出版自然科学的专门出版自然科学书。自然,出版教科书的不能出版文艺书,出版文艺书的也不能出版自然科学书。”^⑧实际执行过程中,就是在中央一级建立若干全国性的专业出版社,率先示范;然后在各大区和主要城市建立专业

化的国营出版社。他甚至还设想了发行专业化：“分工就是按工作性质来划分，哪些批发，哪些零售；或就地区分工，适合城市读者阅读的书由城市的店发行，适合农村阅读的书由农村的店发行。”^⑧与前苏联专业化出版社相比，中国先进行编印发三家分立，然后再进行编辑、印刷、发行三者内部的分工。

三、编印发分立制度的思想渊源

胡愈之对出版业分工的思想，显然不是来自苏联模式，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胡愈之为何力主实行严格的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制度呢？这实际上与包括胡愈之在内的旧中国时期的出版界有识之士欲改变出版业不发达面貌的抱负有关。

1914至1933年间，胡愈之前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逾15年，主编过《东方杂志》。他还组织创办了生活书店（1932年）、复社（1937年）、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和新南洋出版社（1940年）等，对中国的书业有很深的了解。旧中国的出版体制是出版、印刷、发行三项功能合一的，所谓楼上刻书、楼下卖书，前门开店、后院刻书等等。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也是如此，1946年4月，山东新华书店在《大众日报》上刊登广告说：编辑、出版、发行是本店的三件大事。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像一根绳一样紧紧的拧在一起。^⑨

尽管当时出版业的现状如此，但民国时期不少书业人士已从西方出版业得到启发，认识到行业分工的重要性。如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认为：“欧美各国经营出版业者，恒不自办印刷，……故各专其业，即出版者亦复科学、文学、宗教、教科、小说、美术等，各营一二种也。我国则因社会上此种实业尚未发达，故凡关于书业之一切之必需物，皆须自营，而出版业未大发达，无从分工。”^⑩舒新城曾说：“欧美各国及日本的出版业都是分工的：文理工艺等等的专门且不说，甚至一个书店专营一二种杂志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可以集中，出品可以求精。”^⑪民国时期也已经有书业人士提出行业分工方案，来解决旧中国出版业不发达的问题。最早提出出版分工思路的是开明书店的夏丏尊（1886~1946）：“联合书店不出版书籍，但以发行为业务，在全国各省市各县设立分店，其普遍应如邮

局。……现代各书店可自动改称为出版社，出版社专管出版事业，其资本可大可小。各出版社以所出版之书籍批发与联合书店发行，不自设总店门市部与各地分店。”^⑫尽管胡愈之个人早期并未有多少关于出版分工的言论，但1949年3月，胡愈之到北平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谈了五点想法，其中第一点便是：书报贩卖事业即书店、书刊出版社及印刷业，此三者应实行分工，总原则应以国营事业处领导地位，民营出版业及印刷业应在党领导之下。^⑬由此可见，此时胡愈之已有较为明确的出版分工思想，新中国出版体制实行编印发行三家分立制度当与此有关。旧中国书业资深人士欲通过分工改变行业格局和落后面貌的大胆设想，在新中国终于得以实现。

总之，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是在以胡愈之为署长的出版总署的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央路线方针和国家政策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和借鉴了苏联模式，但在出版分工问题上，中国并未亦步亦趋追随前苏联。胡愈之基于民国书业人士的深刻洞识，为纠正中国旧书业混乱无序的状态，推动了编印发三家分立的出版体制的建立。这种体制既不是源自苏联模式，在旧中国也并未出现过，因此是一种富有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

（罗智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注释：

- ①②③④ 胡愈之. 胡愈之文集（第五卷）[M]. 北京：三联书店，1996:349,346,369,404.
- ⑤⑥ 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G].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596,201.
- ⑦ 出版总署全国出版建设五年计划大纲.//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43.
- ⑧ 全国出版事业概况.//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61.
- ⑨ 余敏.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4.
- ⑩ 《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编.中国报刊发行史料[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249.
- ⑪ 陆费逵.我国书业之大概.//俞筱尧等.陆费逵与中华书局[G].北京：中华书局，2002:462.
- ⑫ 舒新城.狂顾录[M].上海：中华书局.1936:155-156.
- ⑬ 夏丏尊.中国书业的新途径.//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G].北京：中华书局，1956:142.
- ⑭ 黄洛峰.胡愈之对新中国出版工作的建议.//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上）[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3.